

中国

人生智慧源流

ZHONGGUO RENSHENG ZHIHUI YUANLIU

武东生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生智慧源流

武东生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生智慧源流 / 武东生著.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4

ISBN 7-310-01504-5

I. 中... II. 武... III. 人生哲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683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电话:(022)23508542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11 千字

印数 1 — 3000

定价 13.00 元

序 言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学派众多,哲人辈出。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民族形式,曾广泛地涉及到关于自然、社会、人生、人的认识及其相互关系的诸多问题,而其中人生理论则可以说是居于核心地位,形成为世界哲学之林中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特殊的哲学类型。中国的先哲讨论宇宙人生问题,往往是就宇宙论人生,就人生谈宇宙。贯穿于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观念是:人生的最高准则就是宇宙的根本原理,宇宙的本根也就是道德的根据和标准。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哲学大纲》)因此,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把握其基本问题和源流演变的过程,具体分析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们关于人的本质、人生理想、人生态度和人生修养的理论,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立足于现实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是一部以“人生哲学”为特定视角研究中国哲学的新著。

该书共分二十章,除对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基本问题、思想体系的框架、各部分理论的相互关系和发生发展过程等一般问题的论析外,特别就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的生平、著述、思想渊源、人生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历史评价等问题,分别作了简要明晰的阐述,颇具系统性。先秦时代儒、墨、道、法等各家人生哲学自然是论述的一个重点,对于秦汉以后的中国人生哲学,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之外,作者对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道教的人生理论,也分别作了专章研究和论述,这样才能对“融释道入儒”的宋明理学道德心性之学的兴起和泛滥有一个源流清晰的说明。视野开阔,取材广博,基本上做到了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是本书的一个特点。面向正在人生道路上探索成长的青年一代,力图为他们提供历史之鉴,因此十分注意文字上的可读性,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我想作者的努力和苦心定能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积极的回应。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所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实际上构成了该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人生哲学自然也是如此。然而,“人生哲学”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由其所规定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人生哲学与世界观理论、与其他研究人的学科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怎样给“人生哲学”下一个比较确当的定义?这在目前的学术界还是众说纷纭、很难取得共识的问题。武东生同志在本书中把“人生哲学”作为哲学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其界定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人生观”,认为其研究对象是人的实际生活中的最一般的规律,主要回答“人是什么”、“人生理想”、“人生诸范畴”(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与命运的关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生与死的关系”等)、“人生修养”等问题,而其核心是“人生理想”。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取一特定视角,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生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来讨论,揭示其包含的基本问题,并藉此对其内部逻辑系统做出分析和展衍,力图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并对现实有所启迪,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对广大青年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就必须加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学科的建设。除了要全面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人生哲学思想宝库,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国进步的积极的健康的人生哲学思想之外,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历代先哲的思想,了解他们是以怎样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人生,追求真、善、美的境界的,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取其积极合理、精粹深刻的内容,并且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使其发扬光大,是中国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最有可能对这门学科的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说,武东生同志的努力也是应该肯定的,同时,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方面的优秀学术成果面世。

方克立

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

导 论

“人生观”与“人生哲学”

“人生”，是人的生活的总名称。人们活动于现实的人生当中，不能不对人生有所思考，思考而有所得并形成一种总的看法或观点，于是有人生观的产生。人生观人皆有之，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生哲学”，就是建立在人生观基础上，经过思想家们的加工改造而形成的。如果作一个简要的界定，“人生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人生观”，即思想家们把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人生观加以提炼和升华，用逻辑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具备理论形态的人生观。

由此来看，“人生哲学”既不神秘也不玄奥，顾名思义，就是对人生进行哲学性的思考和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学问。并且，人生哲学还是各种学问中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学问。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当事者，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有构成自己生活一部分的人生观。不过，我们又不能因为有自己的人生观、不能因为人生哲学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就把“人生哲学”简单化。这是因为人生观并不就是人生哲学，人们都有

自己的人生观,却并不因此就都成为人生哲学家。“人生观”与“人生哲学”,有人用一般人唱歌和歌唱家唱歌的关系来说明,这一比喻颇为恰当。一般人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唱歌,可这种吟唱与受过专业训练的歌唱家之唱歌还是不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由所思所想而形成的人生观,具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而人生哲学则是哲学家们将人生观经过理论化、系统化的加工后产生的,是将人生观加以概括总结、提炼和升华,用一系列特定的概念、范畴、命题组成的系统理论。

能否对自己的活动内容和方式有所“观”,是人区别于宇宙间其他存在物的显著标志之一。而人生观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又对人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人生观人皆有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时代的、民族的人生观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以提出与自己的时代和民族特点相应的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在内容上可以侧重点不同、理论表现的方式上千差万别,可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人生哲学。本书定名为《中国人生智慧源流》,就是希望通过阐释和论析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生哲学,展衍中国传统人生智慧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一直向前发展的文化。中华文化经历了辉煌的发展时期,以其独特的体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当代世界,这种影响仍然是充满活力。世人都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具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生哲学就是这一民族精神表现之一端,并且是异常集中地体现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方面。“哲学”是汉语中的外来语,中国古代也没有“人生哲学”的概念。然而,人生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是内容相当丰富渊阔的部分,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诚如学者们所论,中国哲人的文章和谈论,常常是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的本根,宇宙的本根便是道德的表准;中国哲学

中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话,既讲宇宙,亦谈人生^①。而就人们的习行践履来看,体现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中国人生哲学,在传统社会中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如基督教对于西方人,其影响所及,连一些目不识丁的妇孺也在所不免。作为一种传统,中国的人生智慧又贯穿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生活之中,尽管时代变化了,但在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等方面都打上自己的印记。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生智慧作为一种传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抑或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恐怕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的中国人能否对它有一种自觉而清醒的正确认识。而要了解中国传统的人生智慧,把握中国人生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弄清古代哲学家们都是怎么想的和说了些什么乃是首要的前提。这是本书所以作的基本缘由。

中国文化对于人生“哲学”的理解

“中国人生哲学”是中国历代的大思想家们建立的关于人生的系统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十分吊诡的是,“哲学”这个名词却源于古希腊文,古汉语中只有“哲人”而没有“哲学”。哲学一词是随着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才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初人们将其译作“玄学”或“理学”,因容易和我国历史上“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相混淆而产生误解,后来又据日文翻译成“哲学”。而日文所谓“哲学”,则又是根据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哲,智也”一语翻译的。

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加以系统研究后形成的根本看法。按照古希腊思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想家的理解,哲学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物理学研究人们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目的是求得对物质世界的一种规律的把握,因此也叫作“形而上学”,用现代概念来说,这一部分可以称之为宇宙观或自然观;伦理学研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目的是求得对人生的根本理解,提出人应该怎么样的道理和规范;逻辑学研究知识的性质、形式和方法等问题,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些名称及其所规范内容的研究虽然源自古希腊,在西方有长久的历史,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相当的内容。韩非子曾经这样讲:“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这是把万物所以然的总规律、万物之理的总依据名之为“道”,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注重研究“道”的问题,由研究“道”而形成一种学问即“道学”,实际上就是今天人们所谓“哲学”。“道”包括了“天道”和“人道”两个基本的部分,天道论研究宇宙万物的“本根”、变易及其规律,这与今天人们所说的宇宙观或自然观大体上一致。人道论以人自身及其社会生活立论,主要说明人性、道德的起源和标准、人生的理想、修养的方法等问题,即我们所谓人生哲学;古代思想家们就人的生命问题还讨论形神关系,就道德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社会是否发展的问题,就人的修养又对名与实、知与行等问题有所论述,这和今天人们所研究的认识论、社会历史观问题相一致。并且在中国的先秦时代,还产生过专以“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人们称之为“形名家”或“辩者”,他们和后期墨家一道提出了中国古代比较系统的逻辑理论。总之,就人们今天理解的“哲学”所包含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同样是存在的。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当我们讲到东方哲学时,我们应该要讲到哲学;不过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至于中国哲学,黑格尔曾对孔子及其《论语》作如下的评价:“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

(指《论语》，本书注)，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①这段话表现了黑格尔基于西方文化传统而产生的偏见，也反映出他对中国哲学的无知。他的这段话也曾的确引起了不少中国哲学家的不满。可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应注意到，黑格尔这一关于中国哲学的见解还是包涵了部分的真理，这就是，如果我们肯定中国有哲学的话，这种哲学也是一种与西方哲学有着相当差异、颇具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形态。

“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是由“爱”(Phileo)和“智慧”(sophia)两字组成，用汉语的“哲”对应“智慧”，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哲”的本义就是“聪明”，古文里所谓“哲人”，即才能识见超乎寻常的人。不过，“哲学”之在西方，并不等同于“智慧”，而是“爱”智慧，“哲”之为“学”，就是能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从事哲学工作，就意味着参与带有理知性认识愉悦的活动。正如西方的哲学家们所说：哲学并不带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哲学的结果不是某些数量的哲学的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晰。这是“哲学”在其发源地的基本意思，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哲学”的理解则是格格不入的。西方人所谓哲学是爱智，其所追求的是理性的享受；中国人则把哲学看作是明智之学，其所致意是要做人。因此，“哲”在汉语中解释为“智”，而其内容如《书·皋陶谟》所说：“知人则哲”。“学”在西方意味着分门别类的知识，学习就是为了获取知识；而在古代汉语中，“学”首先在于觉悟、在模仿，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此所谓为己之“学”，既不是为知识而学习，也不是像柏拉图讲的“知识即道德”，而是得之于己又能用之于世，是道德即知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5、119页。

识,目的是“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其实,概念理解上出现的歧义性,反映的是中西两种文化在把握“哲学”时从基本精神方面就有所差异。

“天道论”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像西方哲学所研究的本体论、宇宙论等,在中国哲学史上却并不多见。这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也不把“天”仅仅是当作供人们认知的对象,不去致力于求得关于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儒家从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孟子把“知天”作为人生修养的最后一个阶段,到荀子写《天论》,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家都强调认识“天”的重要性;道家的老子研究宇宙万物,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把“道”看作是万物的根源和总规律,庄子进一步规定“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庄子·天地》、《庄子·天道》)认为把握“道”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然而,在他们看来,认识天道之所以是重要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们常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观念,这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就中国哲学家们所认识和把握的“天”和“天道”来说,这一概括非常地贴切。古人讲“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邵雍:《观物外篇》),这里的“际”表明,天与人不可分隔,更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因为“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程颐:《二程语录》)。“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运》),而“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天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当然准则。正是与此实际的功利目的相联系,中国的哲学家们才注重对天及其道的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之于宇宙,往往视之为客观外在的对象而研究,中国哲学则认为,天道和人道本是相通的,研究宇宙,也就是研究自己,甚至有哲学家认为,研究人自身,把握人道,也就把握了天道,譬如孟子

所谓“尽其心也，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譬如宋明理学家所谓“理者，礼也”。

中国哲学中包涵了十分丰富的知行理论，广泛地涉及到了认识的对象、起源、方法、过程，真知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一系列问题，还产生过专以名与实关系、逻辑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派，如先秦时代的“名家”、“墨家后学”。就是说，要在中国哲学中寻找与西方认识论、逻辑学相匹配的内容，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与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同样是形似而神非，在立论旨趣上就存在着差别。孔子讲“知其言，观其行”，十分反对巧言令色之人，并且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所谓“乐之”，就是依照其所知而实践，获得一种乐趣；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荀子更是明确指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以为讨论学问、获得知识乃在于行为的改进，道德之提高。即使如名家，他们以沉溺于“天与地比”、“山与泽平”、“白马非马”、“狗非犬”等论辩而闻名，所研究的问题似乎属于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关系等纯知识论问题。可是作为先秦名家领袖之一的公孙龙，在谈到辩论名实的目的时则说“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名实》)。就是说，知行观在中国的哲学中，并不像西方近代认识论一样，是专以人的认识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是修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的许多理论，包括我们今天认为是认识论的名词、概念，都有实践的意义，要想了解其意义，就必须有实践的工夫，在日常的生活中用心体察，独立的知、尤其是脱离了行的知，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不仅是没有意义，还是应该反对的。把知与行视作相即不离的关系，又使得中国哲学把真和善统一起来，认为不能离开善来求得真，这也就是张载所说：“穷神知化，乃养盛所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张载：《正蒙·神化》)

哲学是世界观，其赅宇宙万物而探求真理，单就此而言，宗教

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当然哲学和宗教在根本的思考方式上有所不同。中国哲学作为明智之学,其所致意在于做人,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生活的改善,离开善而求真,根据中国哲学家的理解,只能是得妄而不能得真。中国哲学的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文化本有的宗教、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外来宗教中也明显地体现出来。我们知道,真正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道教之为宗教,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差别,道教是一种现世的宗教,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道教的根本教义并没有像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将世界二重化,分裂灵魂和肉体、划分此岸和彼岸,把灵的、天国或西方极乐世界作为人的归宿,也不主张通过禁欲性的官能压抑达到具有神秘意味的情感渴望和灵魂的净化,道教所企慕则是长生不死,是羽化登仙。仙是有神通变化的人,神仙世界并不是与现实的苦难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也不需要舍弃或否定现实的人生才能达到。佛教来自印度,隋唐时期达到了其鼎盛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外来的宗教。可是,真正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有“教外别传”之称的禅宗。禅宗不固守印度佛教的佛性说,以为人人都可以成佛,而且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禅宗舍弃了佛教繁琐的教规和复杂的修持过程,担水砍柴,莫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甚至上有所谓酒肉穿肠过佛自心中留说法;禅宗也不注重佛教理论细密的思辨,提出了所谓“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甚至主张不立文字。实际上,禅宗在其发展过程中还竭力地调和与儒、道的矛盾,认为儒、道、佛是门墙虽异而本相同。

《礼记》中有一篇文章名为《大学》,自从宋代学者重新发现并将其作为“四书”之一后,其中道理就具有了代表传统的中国人对于生活目的基本理解的意义。它是这样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礼记·大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被古人称之为“三

纲目”，“明”者，在于认识天道、人道及天人之际，而这种哲学性认识的中心内容则是“明德”，即认识人道，把握伦常规范。万物有本有末，人的认识内容和目标就有轻重缓急、高下优劣之分别，大学之道的关键在于知道学问的旨归是“止于至善”，即达到道德上最高境界，成就圣贤的人格理想。“止于至善”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目标，也是中国哲学的“大学之道”，中国哲学也研究宇宙自然、研究认识的规律、研究社会历史的种种问题，但这种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的生活实际，是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人手处，最后又要归于实践，将理论在生活实践上加以验证；中国的哲学家一向以为宇宙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宇宙的根本与人的心性本来就是相通的，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就是人生道德的标准；中国传统的所谓“学”，本来并不专指知识的研究，其要义在于身心的修养，因而，学就包括了知识和行为两个方面，而根本则在行。质言之，中国哲学是以人生论为核心，中国人生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是圣贤之学。

中国人生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今天所谓“哲学”，在中国先秦时代被称作“道术”，到了宋代称作“义理之学”。“道术”或“义理之学”包含了“天道”、“人道”及二者关系等内容，其中关于“人道”的思想理论，就是专以人本身为研究对象。不过，“人道”思想在中国古代涵盖的内容十分宽泛，既有狭义的人生观问题，也还包括与今天人们所谓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历史观以及伦理学、政治学等存在交叉关系的问题，如知与行、名与实、形与神、常与变等。就本书对“人生哲学”的界定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相对应的思想学说大体上相当于宋明时期哲学家们探讨的“性命义理之学”，或可简称为“修身之学”。“义理”指具有一般意义的道理，孟子讲“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大体上说明了中国

古代哲学家所以把人生理论称作“性命”义理之学的缘由。由对“性”、“命”的理解和说明为基础,确立人生的最高准则,讨论人生的各个范畴,再提出“为学之方”,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可谓“一以贯之”的通则。因而,以讨论人生最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修身之学”,在中国古代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性命”学说,二是“人道”论,三是“为学之方”。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性”一般指人性,即人的类本质;“命”有必然性、命定、命运等多种涵义。“性命”学说作为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主要讨论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天人关系,其二是人性。“天人关系”古人称之为“天人之际”,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宇宙本体与万物的关系怎样”、“人作为宇宙中之一物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从人生修养的角度探讨“天人之际”,人生哲学所关心的是人在宇宙中地位、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两个问题。在“人性”理论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异说纷呈,涉及的问题深入而广泛,主要有:人性的来源(是生具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人性与天道的关系)、人性的具体内容、人性的善恶评价、人性的同异(在基本属性上人与人之间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性一元还是多元。

“人道”的本义是人事、人伦、为人准则,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中所讨论的“人道”,在人生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意义与今天人们所谓“人生理想”相仿佛,但涵义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理想”意思是对未来事物的想像或希望,作为人生理论的专门范畴,在保留这个涵义的同时,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就是说,人生哲学规定具备现实根据的、合理的想像和希望才是“人生理想”。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讲的“人道”,意思是人生的最高原则或人们习行践履的基本准则,并没有从现实和可能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加以界定。“人道”论除了提出人生的最高准则外,还包括了对人生各个方面问题的讨论。人生哲学应说明“人是什么”、应确立人生的最高准则,同时更应该对人生哲学所涉及的各个基本范畴予以深入而具

体的阐释,这是因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而普遍地所面临的正是这些范畴所概括的具体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哲学家们主要讨论的人生哲学范畴有:义与利、兼与独、情与理、自然与人为、力与命、生与死等。

从字面上理解“为学之方”,意思就是学习的方法和途径。“学”的内容可以非常广泛,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里的“学”主要是指分门别类的文化知识和技能;而荀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则把“学”理解为一种旨在提高道德境界的活动。中国古代哲学家不排斥“学文”,并且许多人还把“学文”作为“美其身”的一个条件,但更看重荀子所讲的“君子之学”,以为这才是学问的根本。因此,他们所讲的“为学之方”,主要是讨论人生修养问题。古代思想家们论及人生修养,所涉及的内容有“为学”的目的、态度、途径、具体方法以及人生境界等问题。

人生观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包括了“性命”论、“人道”论、“为学之方”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又相互关联有机地组成一种系统的理论。在思想史上,较早对这一系统理论加以说明的,大概要算儒家的两篇经典著述《大学》和《中庸》了。《大学》之被后世儒者所推崇,主要在于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的“大学之道”。关于“三纲领”,前面已提及,其关系是:始于发扬自己的品德,其次用高尚的道德来教化百姓,最后从“大人”到百姓,其行为都符合人生的最高准则。紧接着“三纲领”,《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八条目”排列顺序所体现的内部逻辑与“三纲领”完全一致,所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此“修身”是其他七条目所围绕的中心,又是其他七条目之“本”。“修身”以上属于个人之修养,“格物”、“致知”是讲把握义理,“正心”、“诚意”是论修养方法,“修身”以下各条则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